

人物素描

温铁军：在心忧三农20年后有更大关切 (下)



□倪小林

为中国农民寻找出路

为农民立言的学术道路,最终促使温铁军开始了帮助农民共建新农村的行动。这也是他作为另类学者在21世纪初由政策研究进入乡村实践的转折点。

2003年7月,温铁军资助志愿者在河北配合翟城村老百姓集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骨干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发动农民建设本土,探索农村的自我发展路径。从这个办在村里的乡村学院开始,他和大批志愿者们作了一个又一个尝试。

在乡村建设学院里,青年志愿者们承继了80多年前晏阳初开办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的传统。当年的知识分子在翟城村的80亩官地的“试验场”试种良种棉花、花生、小麦,并引进优良肉猪,一度得以推广。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推进农村改良的最直接的尝试。现在,翟城村的乡村建设学院把重点定位在生态农业和环保

农村,发展农村社区金融与农民合作社,以及农村文化建设等方面。在这里的60亩校园内已建立起中国第一组完全使用可回收的当地建材的农村生态建筑群,第一组“六位一体”生态农业循环。

这所特殊的乡村学院培养的农民学员已经遍布各地农村。较为典型的是发生在河南兰考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故事。南马庄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有300多户1400多人。2004年春天,村支书张砚斌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回村后组织70多户农民成立了合作社,现在,他们正在探索城乡之间由对立转变为良性互动的路子,在北京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由合作社成员直接订购农村的大米和其他有机农产品,最初被人称为“购米包地”,现在正在筹划“购蛋包鸡”和绿色乡村旅游,市民与农民结对子等活动。

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完全转移和全部进城现实,志愿者们在河北定县和其他地方的农村实验,针对的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1978年到现在,农村改革成绩斐然,但同期“三农”

却成了整个国家跨世纪的难题。“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之后,不断引发更多争议。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逆的,但广大农民被不断边缘化的趋向难道也一定不可逆?

温铁军说,欧洲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转移出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主要是贫困人口。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伴随工业化向外大量转移人口、转嫁社会矛盾。因此至今还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中国100年来的3次国内战争被称为3次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解放后的新民主主义从满足农民要求的土改起;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农民的合作社起;近20年的改革又从农民自发的大包干开始……弄得无论什么外来思想、内生理论,都不得不在能否解释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上受检验。

为了找到农民不必远离乡土而靠提高农民素质去改变农村面貌的路径,温铁军引领青年志愿者们都还发起兴办了海南儋

州石屋村社区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及其他各种培训项目。推广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基地,翟城村和其他十几个村现已被列为温铁军负责的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和他担任院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大学生实习基地。在中国领导人强调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之后,温铁军们的本土化的创新试验也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直有人说温铁军的乡村建设实验是乌托邦,过于理想化。但他们这些年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去年正式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敲定的我国新农村建设内容吻合。

只有双脚扎在泥土里才有发言权

1993年后我国经济进入高涨的同时农村问题越来越突出,温铁军参加了安徽调查后在《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也

是与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社保等方面相关的农村政策问题。既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更不是粮食问题。此后的1995年、1996年他又发表了“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提出粮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以及“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等文章,其中很多观点的形成和验证,都离不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规律。不久,粮食收入增速连续4年下降等问题,都被他不幸言中。至今,就在记者采访时,他依然强调粮食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粮食以外。

看温铁军的简历有一种奔波的重压感。他说自己人生中有两个重要的11年,前一个11年初中没毕业就去当了农兵;后一个11年在农村试验区实地调查、研究政策,几乎马不停蹄地在乡村奔波。就是这两个都属于冷板凳的11年锻炼了他。他从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而只是一个搞草根研究的实验员。农业问题来不得半点虚假,为解决跨世纪的农民问题,我国需要身体力行,勇于实践的学者,对温铁军这样双脚扎在泥土里的研究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温铁军二十多年的农村试验研究,也为我国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一条新路。其实,5年前他就发起建立高校农村调研志愿者队伍,很多农民出身的大学生愿意回乡调查都可以参加,最低要求是写出调研报告,由他主持工作的单位和有关科研机构评奖。这一方面能够补助困难学生假期回家的路费,另一方面则让农村学生回乡实践,帮助家乡的建设。这些学生在120多所大学建立了支农社团,无形之中也使他桃李满天下。

培根曾经说过,不作尝试的危险和失败的危险是不相等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损失巨大的利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损失的信息是人类一点劳动。如今,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温铁军几乎固执地坚持着脚踏实地的学术风格,这让人们记忆起那些不该忘记的东西,那种带有根本性的规律——实践出真知。

美洲观潮

个人气质决定交易策略

□徐程

自从从误打误撞进入汇市,屈指算来已经十余年。虽没有到“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地步,却也阅尽汇市沧桑。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做外汇;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做外汇。汇市造就了不少致富神话,也使无数人倾家荡产。有的人天性适合做投机,属生而知之者。但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天赋,属学而知之者。本人就是个学而知之者,曾花了许多金钱和精力才窥其堂奥。

我发现美国的那些金融讲演者都有一个共同点,总是充满煽动力,而且都比较激进。有一位讲演者提到一本美国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引起了我的重视。书中对中国的地位非常重视,对中华文化评价甚高。其实中华文化底蕴之深厚非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北美人可以理解的。就拿风水来说,老外写的,不是隔靴搔痒,就是得之皮毛,真正得其精髓的其实一本没有。风水当然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起源于居住在黄土高原的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认识。

联系到做交易,不仅是外汇交易,我们也必须找到一条有效均线的那座山,可以是一个阻力位或支撑位,也可以是一个黄金分割的位置。以这座山为依托来构建我们的交易思路和策略。在汇市里 Swing Trade 以及 Position Trade 都必须基于这一理念之上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时间框架(Time Frame)不同造成了这座山的不同形状,“结穴”即建仓也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区别。同时,还要看不同的技术指标。指标已经达到2000多个了,选择什么或选多少,都是个问题,这些都涉及你必须掌握了多少具体操作手段。我们经常说不能输在战略上,难道可以输在战术上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情。要做到无情只有一个方法,按照一套系统来操作,不见系统的信号不下单。如果不能赚钱,那说明系统不行,那就修改系统,直到它被证明是有效的。

但是,系统是因人而异的。人的性格、气质不同,他采用的系统也不同。Full Time 操作和 Part Time 操作更有其特殊性。一般来说,气质敏感和行动快捷的人适合做短线,而性格沉稳、逻辑性强的人适合做中长线。既擅长短线又精于中长线的全才很少。有人可能会想全都掌握了技术面、基本面和感觉,不是可以赚那100%了吗?事实上,三者兼备的人很可能是连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人。

所以,了解汇市前应先了解自己,问问周围的人,或做些心理测试题,然后制订交易的策略。

多声道

中国经济发展推动解决全球失衡

金人庆(财政部长)

中国政府一直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各方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不平衡实现有序调整。近年来,中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积极采取包括财税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重点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解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前一阶段各项经济政策的结果,也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必将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增长、推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有序调整做出贡献。

利率应随市场变化不改变反而会“利空”

樊纲(经济学家)

利率作为一个经济变量,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新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调整利率对市场有利,不改变反而会“利空”。应改变现有的单向思维,综合各方面因素思考政策,适时调整利率,若应调整而未调整会使经济问题累积得更严重,未来的调整幅度将会更大,对市场的影响也将更大。这便是成熟市场与不成熟市场的差别。资本项

目的开放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际上,渐进开放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中。

当前流动性管理任务艰巨

项俊波(央行副行长):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投资、信贷回落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挑战任务具体表现在,当前流动性管理任务艰巨;物价上行风险有所加大,整体通货膨胀压力值得关注;金融宏观调控要求不断提高,金融调控手段有待完善。对下一步的工作,要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成效,保持金融宏观调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改进货币政策传导,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调整优化信贷结构,稳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

缩小美国贫富差距 投资教育是关键

伯南克(美联储主席):美国人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要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外来投资和贸易设置保护主义障碍是不可取的,最明智的措施是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教育和培训,同时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帮助。(雨人摘编)

公共产品“豪华化”是在背离大众

□李长安

有关公共产品“豪华化”甚至“奢侈化”的现象近来再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各地竞相兴建豪华的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如新型大剧院、歌剧院、艺术中心等);还有一些城市公交车的竞相“空调化”等等。笔者以为,这些做法,不仅与公共产品服务的本质性质相违背,也是对公共财政的浪费,应该引起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毫无疑问,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公益性需求,因此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外部正效应”或“公益性”。也正因此如此,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需要由政府财政投入或者资助。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是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政府财政的大量投入和补助。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产品作为一种本来应该大众化的、平民化的产品,它们的

“豪华化”和“奢侈化”就是对普通大众的背离。

不仅如此,盲目追求公共产品的豪华化还会带来不少负面作用,加重了公共财政的负担,降低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从表面上来看,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近些年来快速增长,财政实力越来越强大。统计数字显示,近10年来,我国的税收年均增速高达近20%,几乎为GDP增速的一倍多。而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了21.9%。这个数据同样超过当年GDP增长的一倍。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也给了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的底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些城市的公共项目“赶英超美”的同时,我国公共财政却出现严重的支出不平衡,特别是在教育、住房、养老、医疗等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方面,不仅总量上捉襟见肘,分配结构上也严重失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

比例必须达到4%,而目前还不到3%;社会保障支出,仅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高达数千亿元,“窟窿”巨大;普及性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更是投入寥寥。比如目前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不到3000座,平均40多万人才一座;博物馆不到1500座,平均80多万人才一座。这些数据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人口仅有500万多的丹麦却拥有200多座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英国伦敦平均每5万人就有一个博物馆。

在分配结构方面,公共财政的分配在城乡之间落差巨大。根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2004年农村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与农村人口占全体国民比例极不相称;全国近4000个乡镇没有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约有5000多万农民无法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村一级文化设施更是严重不足,不少地方的文化活动室、图书室等年久失修,没有文化活动现场、没有文化活动内容在贫困地区比较

突出。公共产品的“豪华化”与“奢侈化”还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对城市建设和节能环保也会带来不少消极影响。上百元乃至上千元一张的大剧院门票足以把大多数老百姓挡在门外。观众的流失给大剧院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上座率低,设备利用率低下。再以公共交通为例,目前在一些城市大量出现的空调公交,却由于其票价高于普通公交而造成资源浪费,即使如北京公交车票改革后空调车票价与普通公交一样,却又造成空调公交的拥挤,交通紧张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空调车的增多必定会加大能源的消耗与污染的加剧,这与倡导“节约型”社会岂非南辕北辙?

坚持联系汇率制 人民币无碍港元地位

任志刚(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联系汇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但现在港元与美元挂钩的政策坚定不移。人民币升值对港元有心理影响,但无碍港元地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些城市的公共设施大可不必在硬件上超越国情而向发达国家看齐,而是在管理水平和适用性方面下大功夫。如何尽快地回归公共产品的公平化和大众化,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从李嘉图到小穆勒

□梁捷

最近有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学的方法。威斯康星大学豪斯曼教授用一个词来形容目前学界的研究方法,混乱。在他主编文集《经济学的哲学》里,他号召大家转回头研究思想史的源头,重读两百年前的经典著作(尽管多数经济学家从未读过),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来认识经济的。

十九世纪初,经济学的第一本经典亚当·斯密之《国富论》已经出版,可惜影响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公共政策的决策自有另一套办法。公认排在经典第二的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要迟至1817年才出版,李嘉图在1807年前后甚至还没有真正对经济学问题产生兴趣。

在多种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国富论》之后,《赋税原理》之前的这段时间简直是思想史上的真空期,唯有熊彼特不这么看。他的《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写到18世纪末就停止,亚当·斯密是最后一章,但只能看李嘉图思想的余绪。《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陈旧、矛盾、粗糙方法的经济学发展到极致,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从19世纪才有开端。

19世纪的思想从一片乱嘈嘈的争论中开始。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多年,但对英、法、德各国思维的潜在影响连续不断。黑格尔就从中感受到一种“时代精神”,它无处不在,经济学也烙上了独有的时代印痕。

当时英国的经济学者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政策研究。虽然斯密就有强烈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但这在实践中的推广要迟上数十年。英国的市场化过程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由保守党全力推动,商人和经济学家的作用很有限。这个斗争过程持续了数十年,这才逐渐获得民众的支持;第二,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系列政治政策的组成部分,废除“谷物法”表明英国政策逐渐走向务实,不再狂妄地认为“世界各地都有英国的利益存在”。

思想上,边沁的功利主义取得极大成功,他精密地分析了人们分析问题应有的态度,鼓吹冷静客观地结合考虑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审慎地制定法律,更审慎地制定经济政策。詹姆斯·穆勒是最铁杆的边沁信徒。

很多学者认为詹姆斯·穆勒是个过渡性人物,可他这种过渡性也实在太重要:他引导李嘉图研究斯密和边沁的思想,并鼓励他写下了《赋税原理》,他培养了天才的儿子约翰·穆勒,他把马尔萨斯思想引入英国政治经济学,他写下最早研究印度的专著《英国印度史》等等。每一件事都使他值得在思想史上大书一笔。

李嘉图的本行是证券经纪人,27岁才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学。他读了《国富论》,顿时产生要“体会一下这种研究感觉”的想法。此后,李嘉图开始关注经济学的自然发展。穆勒的一本驳斥重农学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为商业辩护》,李嘉图很感兴趣,从此与穆勒通信,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评述时事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在《金块高价》这本书里,李嘉图逐渐形成了他的货币思想。

穆勒很惊喜地发现了李嘉图的天才,再加上他的宗教信仰逐渐从长老会转向教会,和李嘉图一致,从此两人关系更加亲密。后来,凯恩斯最杰出的学生斯拉法耗费半生心血整理李嘉图文集,其中多半是他的通信集,我们可以看到和穆勒的通信在文集里占据了极重要地位。1815年8月,穆勒热情洋溢地鼓励李嘉图把他的想法写下来。1817年4月,《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出版,熊彼特认为,这才是现代经济学的第一座丰碑。

穆勒自己缺乏开创体系的雄心,也只能看李嘉图的思想极好地概括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李嘉图去世得早,穆勒就安心地传播和转述李嘉图的思想。

不过我认为他的另一项工作更为成功,那就是培育了儿子约翰·穆勒。小穆勒从六岁起,每年都学会一种外语,这都是父亲的功劳,小穆勒终身秉持经济学常识,也是父亲在每天饭后散步时讲给他的。虽然日后他的想法已经不完全局限在边沁和李嘉图的框架内,但基本方法和理念,特别是面对现实问题的审慎态度,终身都没有变化。几十年后,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统治学界半个世纪之久的综合性巨著。古典经济学从李嘉图始,至小穆勒,完成经济学的第一个高峰。

老穆勒的工作还远不止于此。马尔萨斯早年写出人口学巨著,后期也转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日后凯恩斯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马尔萨斯通过老穆勒和李嘉图等人结识,两人既有鼓励和启发,也有交恶,错综复杂。马尔萨斯最终的结论也与李嘉图不一致,但两人各自书写的政治经济学都被公认为是不可绕过的杰作。

围绕老穆勒,分别通向日后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甚至我们在小穆勒等人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几种进路之间的紧张关系。混乱未必是什么坏事,两百年前的混乱造就了数十年的辉煌。但眼下混乱的研究方法,却不知会引向何方。